

一九八八年蘇聯政經改革與難題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九年新年祝賀詞中說，一九八八年是蘇聯各方面皆具有轉折性的一年。在過去一年內，改革過程繼續進行。他說，蘇聯在經濟、政治、社會和精神各方面皆獲得了新的成就。①

去(一九八八)年六月，蘇聯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九次全蘇共黨代表大會。蘇共第十八次黨代會係在一九四一年召開，其間相距了四十七個年頭。這次黨代會召開的目的在制訂進一步改革的目標。事實上，戈巴契夫的改革路線，在黨代會上獲得了肯定。與一九八七年相比，蘇聯一九八八年的經濟發展已略有起色。在去年內，蘇聯工業的百分之六十的企業，開始實行「國營企業法」，完全按照經濟核算、自籌資金及自負盈虧原則運作；一半以上的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也朝個體制過渡。戈巴契夫說，經濟改革已使一九八八年的國民收入和勞動生產力提升，糧食、日用商品與服務業皆已獲改善，住屋和文化設施皆增加甚多。不過，戈巴契夫檢討說，改革計畫的進度較預期的慢，未能完全滿足人民的日常需要。因此，他警告蘇聯人民說，不要預期今年會出現奇蹟。經濟改革尚未全面展開，今年仍有很多工作要做。②

去年，蘇聯已開始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戈巴契夫說，此項改革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法治的國家，注重個人利益，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人民將有權廣泛地參加國家的管理。③蘇共第十九次黨代會通過了幾項有關政治改革的決議，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各級權力交給人民代表機構，分開黨政職能，杜絕以黨代政等。

此外，蘇聯的政經改革並非一帆風順，遭遇到不少阻力與困難，使蘇聯的改革工作愈加複雜。

註① 「戈巴契夫新年祝賀詞」，真理報(Pravda)，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第一頁。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①。

蘇聯黨政體制改革

蘇共第十九次黨代會通過了一項「關於蘇聯社會民主化和政治體制改革」決議案^④，內含十三點；其中第一點列舉政治體制改革的一般目標，如：給予社會最大範圍的自我管理，調查公眾意見與人民要求，確保每一民族和部族的自由發展，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保障公民的憲法權利，確保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之義務的履行，畫分黨機構和政府機構的功能；為政治體制創造一個自我更新的機制。按照該決議，這項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極為廣泛，而且必須與經濟改革相互配合。

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部分是，蘇聯共黨自身的改造。^⑤蘇共認為，黨如果不進行民主化，將不能維持其先鋒的角色。蘇共黨內民主化的要點為：提升黨基層組織的獨立性，增進一般黨員對黨務工作的參與，放棄人民入黨的「名額分配」制，充分恢復集體討論與集體決議原則。對國家、政府、公共團體的相互關係而言，黨不應取代這些機構的功能，而是透過這些機構的黨員追求黨的目標。

在改造黨功能方面，蘇共第十九次黨代會決定了幾點原則性建議：第一，增加蘇共中央委員會對政治局工作的參與；第二，政治局對中央委員提出定期報告；第三，創組新的、中央委員會之下的分組委員會，由中央委員組成，以討論內政與外交問題；第四，公布中央委員會全會的速記報告；各級黨委員執行局對相關黨委員會提送定期工作報告；第六，賦予各級黨委會罷免部分或全部執行局成員的權力。

在幹部政策方面，蘇共將取消高幹名錄 (*Nomenklatura*)，^⑥並制訂選拔幹部的民主程序，以訓練與複訓為基礎。各級書記，包括蘇共中央書記一律以差額選舉和秘密投票方式產生；所有各級黨委會書記祇能連任一次，每任五年（其他選任公職亦然）。蘇共黨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前後兩次代表大會之間可舉行黨代會。黨代會可換選中央委員會的百分之二十的成員。蘇共準備撤銷現有的中央委員會監察委員會與中央檢查委員會，另成立中央監查與檢查委員會。此外，各級黨組織也將縮小。

註④ 蘇共第十九次黨代會關於「蘇聯社會民主化與政治體制改革決議案」，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第二頁。

註⑤ 原「政治改革決議案」第七至第八點，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第三頁。

註⑥ *Nomenklatura* (高幹名錄) 是蘇聯最高黨政職位的名錄，該名錄不僅列出高等職務的現任負責人，而且其繼任人員也列於其內。凡是名列其上的，都是蘇共上層領導人物。蘇聯人權領導科學家沙哈洛夫稱之為「新階級」。參見，伏斯倫斯基 (Michael Voslensky) 著，*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4)。

去年九月三十日，蘇共中央突然舉行中央全會。會中，蘇共五名高層領袖被解除職務。這五個人包括兩名政治局委員（葛羅米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所羅門柴夫，監委會主席），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狄米契夫及道爾吉赫），一名中央書記（杜布萊寧）；一些新人紛紛補進。同時，蘇共中央成立了六個委員會：（一）黨的建設與幹部政策問題委員會，主席由中央書記拉左莫夫斯基（G. P. Razumovsky）擔任；（二）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為中央書記梅得維傑夫（V. N. Medvedev）；（三）社會經濟政策問題委員會，主席為中央書記斯留涅可夫（N. N. Slyunykov）；（四）農業政策問題委員會，主席為中央書記李加察夫（E. K. Ligachev），副主席為中央書記尼科諾夫（V. P. Nikonov）（其他各委員會尚未設副主席）；（五）國際政策問題委員會，主席為雅可夫列夫（A. N. Yakovlev），（六）法律問題委員會，主席為契布瑞夫（V. M. Chebrikov）。⑧每一委員會的成員在二十至二十四名之間，由中央委員擔任，蘇共中央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布了六個委員會的委員名單。⑨蘇共認為，成立各專業委員會是體現黨集體領導的重要措施，它們將決定蘇聯國內外政策的重大方針；各委員會最少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⑩

在這次黨領導階層人事變動之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葛羅米科辭職，由戈巴契夫繼任。從此，在蘇共中央內，布里茲涅夫時代的人物已清除殆盡；戈巴契夫權力大增。他已兼任蘇聯國防會議主席，兼國家元首之職，顯然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按照蘇共十九次黨代會的決議，蘇聯各級蘇維埃的結構與功能將進行重大的改變⑪。該決議指出，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性方向是，給予人民代表蘇維埃以充分的權力，並以其作為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體制與自治制度的基礎。依據上述決議，蘇聯於去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布「蘇聯憲法修改與增補」（草案）及「蘇聯人民代表選舉法」（草案）；十二月一日正式通過並公布實施。

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特點是，設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人代會」）作為蘇聯最高權力機構，每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可召開臨時會議。人代會在其代表之中選舉最高蘇維埃代表，分別組成聯盟院與民族院，各有二百多名代表。新型的「最高蘇維埃與舊制的不同。舊制的最高蘇維埃與新制的人代會相似，並無實權，形同虛設。新的最高蘇維埃是「蘇聯政權常設的立法、管理與監察機構」，⑫每年舉行春秋兩次會議，每次會期二至四個月，與西方的國會相似。兩院各設各種常設委員會，其成員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一日，第一頁。

註⑧ 「蘇共中央全會關於蘇共中央委員會分組委員會的決議」，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至第二頁。

註⑨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頁。

註⑩ 蘇共十九次黨代會關於「蘇聯社會民主化與政治體制改革之決議案」，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第二頁。

註⑪ 「蘇聯憲法」（增修本），第一一一條，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第一頁。

由最高蘇維埃代表中選出，以執行立法、審法、籌備等諸多工作。最高蘇維埃代表改爲專任職務，不再擔任其他工作；人代會代表在開會期間，可暫免執行其原有工作。

按照增修憲法，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由人代會選出，這與舊制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選出的主席團主席大不相同。後者是虛位的國家元首，而最高蘇維埃主席則是擁有實權的國家元首。在重大內政、外交及國防事務上，他對最高蘇維埃負責；蘇聯的政府首長（部長會議主席）、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蘇聯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等皆由他提名任命，事後向人代會提出追認。最重要的是，他領導國防會議，主持對外談判並簽署條約。以往，這兩項職權都屬於蘇共總書記。

蘇聯增修後的憲法規定，人代會選出一個「維護憲法委員會」，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及十六名委員組成，任期十年，委員從政治與法律專家中選出；其任務是，主動或秉承人代會及蘇聯最高蘇維埃的委託，研判審議中的法律草案是否符合憲法，以及其他審議工作。

在表決修憲案前，戈巴契夫對最高蘇維埃說，沒有整體的生活民主化、不使蘇維埃成爲代議制權力機關、不使人民自治機關復活，改革深化是不可能的。他並說，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問題，不能一舉解決，而需按部就班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第一階段的基本內容是：更新蘇維埃的結構，革新最高政權機關的形成與活動程序，與更新選舉制度。第二階段將是調和蘇聯與加盟共和國的關係。這方面需要檢討的問題包括：加盟共和國的地位，在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生活方面擴大其權力與機會，並在這個基礎上強化蘇聯聯邦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也將解決與自治共和國、自治省及自治州的關係。最後一個階段，將是重組地方權力機構。^⑫

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選舉。

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

一九八八年是蘇聯「國家企業（聯合）法」開始實施的第一年。按照計畫，蘇聯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的工業企業（或聯合公司）開始按「經濟核算」原則運作，自籌資金，自負盈虧。據蘇聯的統計，全蘇聯已有七萬六千家企業、組織和集體農莊按照新的經營條件運作；這些機構的勞動人數約爲五千一百萬人，占國民經濟中工作總人口的百分之四。^⑬到去年十月爲止，工業

註⑫ 「戈巴契夫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二頁。

註⑬ 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頁。

部門內百分之六十的企業已改爲租賃承包；此外，建築部門內百分之十五、貿易與公共伙食部門內百分之十四、衛生保健部門內百分之四的企業也已改爲租賃承包。一般說來，在完全經濟核算條件下運作的企業，其勞動生產力的成長速度皆高於未經改造的企業機構。^⑭

農業改革是一九八八年中蘇聯經濟改革的重點。爲此，蘇聯召開多次會議專門討論農業問題。其中較近者有兩次：一次於十月十二日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召開，其主題是「發展農村租賃與改造農村經濟關係」；一次在於十一月十四、十五日在莫斯科南三百多公里的奧紐爾（Orel）市召開，其主題是「農村社會發展與加速生產」。^⑮

一九八八年內蘇聯農業改革的重點包括：

(一)繼續推展農業租賃制度。蘇聯爲改革農業，起初實行「經濟核算」，然後推行農業承包；一九八八年內，進一步推行長期租賃承包制度，其租賃期限不但可長達五十年，而且可將土地轉租給下一代。蘇共認爲，農業租賃制度不是一個短期的運動，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不實行這個制度，蘇聯農業無法加速成長，農村生產力也不能達到新水平。^⑯

(二)改造農村經濟關係，把土地還給土地的「主人」。戈巴契夫在前述的兩次會議中皆曾強調，現存的蘇聯農村經濟（生產）關係是勞工與僱主的關係，此一關係以行政命令爲基礎，因此無法激起農民的創造性、積極性與主動性。一旦蘇聯政府把土地還給（租賃給）農民，使其成爲土地的主人後，他們與消費者及政府的關係，將建立在經濟方法、納稅、價格、貸款、利率償還日期等基礎上。

(三)發展農村建設，改變農村投資方向。蘇共認爲，改善農村生活條件與提升農業也有密切關係。因此，蘇共建議更大膽地改變農村基本投資的方向，加速農村社會改造的速度；也就是，在農村將建造更多的住宅、學校、醫院、道路、商業企業、文化與交誼場所等。此外，蘇聯已撥鉅款以增建農村倉庫與加工設施。

(四)加強農業科技與有關農業改造的理論研究。爲使粗放耕作改爲集約化生產，蘇聯已開始加緊發展農業機械並採取較合理的耕種方法。同時，在改造農村生產關係、農業生產部署及農業週邊設施發展方面，將對很多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研究。

(五)擬訂「土地租賃法」（草案），並將重新制訂「土地使用法」。在蘇聯農業改革過程中，承包制是跨進一大步；租賃制是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發展農業，改造農村經濟關係」，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四日，第一至四頁；「加速農村社會發展」，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至三頁；「戈巴契夫講詞」，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至二頁。

註⑯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第一頁。

承包制的另一種形式，而長期租用土地的租賃承包制似乎是最後形式。蘇聯正總結一切現有的經驗，正面的或負面的，並以此為根據，擬訂關於租賃的法律，且考慮擬訂新的「土地使用法」。

此外，一九八八年內蘇聯國民經濟管理的組織結構繼續改善。聯盟部與加盟共和國基本上皆為兩級制，管理局及其他中間環節皆已取銷。各加盟共和國、省和邊區亦然。在一九八八年中，合作社的數字已增加。^⑰

一九八八年的經濟情況比一九八七年好，但是比預期的差。例如，與一九八七年相比，國民生產收入成長百分之四·四（一九八七年成長百分之二·五；以下括號內皆為一九八七年之成長率）；國民生產毛額（即西方的GNP，在生產性國民收入內加上勞務收入）成長百分之五（三·三）；工業生產成長百分之三·九（四·八），民生必需品成長百分之五·一（三·四）；農業成長百分之〇·七（〇·二）；個人實際收入成長百分之三·五（二·〇）；商品零售總數（國營及合作社商店）成長百分之七·一（負〇·三）；社會勞動生產力成長百分之五·一（二·四）；基本投資成長百分之四·八（六·〇）；收費勞務成長百分之十五（四·三）；對外貿易成長百分之二·一（負二·二）。^⑱至一九八九年元月止，在蘇聯已登記的聯合企業已經有一九一家，其中二十七家係與其他共黨國家合資經營，一六四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合營。^⑲

去年全蘇國民生產毛額約為八千六百六十億盧布，按去年底蘇聯公訂滙率計算，約為一兆四千七百三十億美元；那麼，蘇聯按個人計算的國民生產毛額約為五千多美元。蘇聯工人及服務業人員每月平均工資為二一七盧布（約值三五八美元）；七分之一的工人，其工資超過三〇〇盧布（約值四九四美元）；約有三百萬工人，其平均所得未超過八十盧布（約值一三一美元）；集體農莊農民月平均工資為一七八盧布（約值二九三美元）。^⑳

就整體經濟發展而言，蘇聯經濟改革未能全力施為，國民經濟尚未達到應有的發展速度，若干重要指標未達到預定目標，如國民生產收入僅增加百分之四·四，而計畫指標為六·六。很多工業企業未能完成合同義務；由於農業在生產、加工、儲存等方面有缺陷，故難以改善糧食的供應。此外，工資支付的成長高過勞動生產力的成長；人民幣幣收入的增加並不能買到足夠的商品與服務；很多單位有赤字；工業部門內有五分之一的企業未完成積累的任务，十分之一有虧損；國家支出的增加繼續高於收入；

註⑰ 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第四頁。

註⑱ 「一九八八年蘇聯社會與經濟發展：蘇聯國家統計委員會公報」，真理報，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三日，第三頁；關於一九八七年統計見，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四日，第一頁。

註⑲ 真理報，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三日，第四頁。
註⑳ 同註⑱，第三頁。

國家財政狀況仍很複雜。^②

以上是一九八八年蘇聯經濟發展的概況；以下檢視一下，蘇聯一九八九年的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②從好幾個方面看，蘇聯一九八九年國家計畫是比較特殊的。第一個明顯的特點是，這個計畫所制定的很多目標都超過第十二個五年（一九八六至九〇）計畫所預定的。另一個特點是，在經濟的結構發展上將有急遽的轉折，也就是要把大部分資源用於改善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

今年內，蘇聯經濟方面最重要的任務是，把經濟的各個部門都納入新經濟機制之內，按照經濟核算、自籌資金、自行還債的原則運作。去年，已有很多企業實行這個制度，但其中有些企業並未徹底改變。在一九八九年內，預期不少企業因經營不善而面臨關閉；蘇聯當局準備把這些企業租賃給從業人員或交給合作社，使其不至完全消失。

依照年度計畫，一九八九年的國民生產收入將增加百分之三·八（低於一九八八年的四·四）；但國民生產毛額却增加百分之四·五，其中收費勞務成長百分之八·一。勞務大部分來自合作社與個人勞動（皆屬於私有經濟部門）。

由於蘇聯多年來鬧房屋荒，因此趕建住宅是蘇聯經濟發展的重大任務之一，一九八六與一九八七年的成績不壞，一九八八年雖然祇成長百分之三，但仍較一九八五年好。依照計畫，蘇聯今年應當建造一億三千五百九十萬平方公尺的住宅面積，也就是較去年成長百分之五·一。解決糧食問題是蘇聯今年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點；蘇聯當局企圖利用三個方法達成這個目標。第一，強調與大力推行農業租賃制。第二，確保農具的供應。第三，提高農業機械的技術水平以提高其農耕效率。一九八九年的非食物類的日用必需品也預定大幅成長，不僅要超過一九八八年的成長水平，而且要超過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所定的標準；不但產量力求增加，種類也儘量多樣化。

總之，一九八九年蘇聯的發展以消費為其導向，如果獲得成功，戈巴契夫可以爭取較多人民的支持以繼續推行其經濟改造。

政經改革難題與因應措施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時，鑒於蘇聯經濟的停滯不前，處於危機的邊緣，乃大力推行經濟改革。稍後發覺，單推行經濟改

註② 同註①，第一頁。

註③ 「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馬斯留可夫關於一九八九年蘇聯經濟與社會發展國家計畫的報告」，消息報（Izvestia）（Cassia），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至四頁。

革難以達到目的，必須同時推行政治改革，才能激發人民的主動性。於是，大力倡導「民主化」與「公開性」，進而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法制改革。這些改革雖然獲得絕大部分知識分子與部分人民的支持，但在實踐過程中仍然難題重重，舉步為艱。茲列舉較明顯者於後：

(一)保守勢力力抗改革。目前蘇聯保守勢力普遍存在，在黨幹、官僚、軍人、農民、工人、消費者及黑市者之間皆有。這些人抗拒改革的動機不同，也不易形成龐大的反對改革勢力，但在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中仍發生一定程度的作用。有些人特別痛恨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在制訂有關私人企業與合作社的法規時，設定較大限制，使其不易活動與發展。又如，在與外人合資經營法規上，他們堅持蘇聯保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致使外資裹足不前。若干黨幹與官僚擔心，改革可能令其失去工作，因此不是百般阻撓各種改革的倡議，就是盡力拖延其執行。例如，有些官僚爲了反對改革，把糧食儲存於倉庫內任其腐爛而不運出分配；有些來自高加索的載糧列車，到達莫斯科後被無故遣返……，這些作爲的目的在使人民缺糧，心生不滿，進而反對改革。

(二)人民對改革的熱度或信心已降低。最近三、四年來，蘇聯經濟改革的呼聲雖然甚囂塵上，但經濟發展並沒有明顯的改善，尤其日用必需品依然短缺如故。因此，部分民衆對戈巴契夫改革的熱心與信心逐漸轉變爲懷疑，有的採取了嘲笑的態度。例如，在去年蘇共十九次黨代會上，一名工人問：「改造在那裏？」這句話在蘇聯已普遍流行。

(三)黨幹無能，黨紀不振。蘇聯報紙指出，²⁴去年蘇共各級在「報告與選舉」中未能引進有才華的組織者。同時，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各個機構在改組之後，效率也未見增加。因此，很多蘇聯人民相信，改革工作緩慢固然是由於受到保守人士的阻礙，但也由於黨幹無能的緣故。此外，以往黨幹不遵守政策路線定會受到嚴重處罰；現在在「民主化」與「公開性」的庇護下，黨幹們對黨的決策往往陽奉陰違而不受到處分。

(四)民族紛爭不易解決。自從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哈薩克共和國發生學生暴動後，蘇聯境內民族問題或事件紛紛出現，每一問題或事件幾乎皆非常複雜，難以圓滿解決。在一九八八年，最大與持續最久的兩個問題：一是納卡諾·卡拉巴赫自治省歸屬之爭，此一事件牽涉到亞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兩個民族和兩個加盟共和國；一是波羅的海邊三個加盟共和國內的爭取主權的運動。今年元月一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容許納卡諾·卡拉巴赫自治省成立特別管理委員會直屬蘇聯最高政權機關，但保留其在亞塞拜疆共和國內的自治省地位。²⁵關於第二個問題，仍有待解決。

(五)非官方組織眾多。隨著蘇聯政治氣候的不斷自由化，非官方組織在蘇聯社會上扮演越來越明顯角色，據去年蘇聯官方統計

註²⁴ 莫斯科新聞週刊 (Moscow News)，第五十二期 (一九八八)，第八頁。

註²⁵ 消息報 (下午版)，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三日，第一頁；及十五日，第一頁。

，這類非官方組織約有三萬個；^②這些非官方組織就是以往的非法組織。據去年的一次民意調查，約有百分之五十的蘇聯青年是非官方組織的成員。^③非官方組織不但為數衆多，其政治見解亦各不相同。去年五月，來自蘇聯各地的一些非官方組織的代表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代表大會，宣布成立「民主聯盟」，公布「黨綱」。^④這是蘇共政權成立以來，首次以反對黨出現的民間政治團體。非官方組織經常發動示威活動，並積極徵召成員，除了碰到一些警察騷擾外，至今尚未受到鎮壓或制止。這些組織逐漸成為蘇共在爭取民心上的競爭對手；也是政治活動中的潛在挑戰。

(六)民生日用必需品依然不足。去年，蘇聯的日用必需品生產雖有較快的成長，但仍不足以解決民生日用品短缺的問題。蘇聯未能立即克服日用品短缺現象的基本原因有三：1. 以往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以致輕工業機器設備多未能及時更新。2. 企業單位改爲自主經營後，以追求利潤爲主要目標，因而停止生產廉價商品，而生產高檔商品。3. 人民收入增加較快，消費品的生產跟不上。不過，人民生活如不能獲得改善，對改革的興趣將會逐漸降低。

(七)財政赤字嚴重。去年夏，蘇共機關刊物首次透露，蘇聯財政上有赤字；^⑤同年十月，蘇聯財政部長高士齊夫(B. I. Gostev)作預算報告時指出，一九八九年的國家預算案中，赤字達三百六十三億盧布(按去年底蘇聯官方匯率計算約值六百億美元)。今年初，蘇聯宣布，爲復建亞美尼亞地震災區需增列三十億盧布(約值五十億美元)。發生嚴重赤字的基本原因是，很多企業經營不善，國際原料與能源價格下跌，使蘇聯政府收入銳減；同時國家補貼增加。例如，一九八八年蘇聯政府對食品等價格的差額補貼爲六百六十億盧布，占政府總支出的百分之十四·九；一九八九年，同樣的支出已增加爲八百七十九億盧布(約值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占政府總支出的百分之十七·八(其他如房屋等補貼不計算在內)。目前，財政赤字已成爲蘇聯政府前所未有的重大問題。

(八)部分企業經營不善。目前，蘇聯的國營企業中，有百分之十二經營不善而有虧損，令國庫每年增加一百八十多億盧布的支出；去年底，四十多家企業被宣布破產。^⑥這些經營不善的企業不但未能實現蘇聯政府歲入的預算，反而成爲支出的負擔。

註⑤ 眞理報，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第三頁。

註⑥ 據蘇聯論壇與事實(Argumenty i fakty)週刊，一九八八年第三十一期報導，蘇聯社會學研究所最近一次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百分之五十的蘇聯青年參加非官方組織。

註⑦ 國際前鋒論壇報(IHT)，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第六頁。

註⑧ 卡加列夫斯基(K. Kagalevsky)，「亟待解決的國家財政問題」，共產黨人(Kommunist)，第十一期(一九八八年)，第六十六至七十三頁。

註⑨ 眞理報，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四頁。按，一九八九年蘇聯政府總收入爲四、五八四億盧布，總支出爲四、九四七億盧布。

註⑩ 同註⑨。按，蘇聯政府一九八九年用於各種社會補貼的總數爲一、〇三〇億盧布，占總支出的百分之二〇·八。

註⑪ 經濟週報(Ekonomicheskaya Gazeta)，第五十二期(一九八八年)，第十一頁；國際前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十三頁。

(u)物價改革未能推行。據蘇聯經濟學家在今年初接受「莫斯科廣播電臺」訪問時指出，蘇聯實行經濟改革後，發展仍然不夠快，除了因為成千上萬的企業按老方式運作外，還沒有進行物價改革與沒有生產資料自由市場也是主要原因。^②戈巴契夫始終想進行物價改革，但有見波蘭與中共物價改革的經驗，未敢貿然進行，深恐因此引起政治上的不良後果。另一方面，很多人民以為，物價改革已經開始，頗有怨言；事實上，有的物價確已變相漲價。目前蘇聯的若干物價根本不合理，無法反應成本。

(f)農業與外貿表現不佳。近年來，蘇聯在農業上的投資大，但成就小；農民是土地主人的心態尚未恢復。此外，以往蘇聯農業投資祇注重農業本身，而忽視農村周邊、社會與文化等設施，使城鄉差距未見縮小反而拉大，使人民從事農業的意願降低。此外，蘇聯在近兩三年來不斷強調加強對外經濟與貿易關係，但成就很小。例如，一九八七年不但出現了蘇聯歷史上少見的外貿負成長，而且出現了入超。一九八八年雖有改善，但幅度不大。蘇聯經濟改革重點之一是更新技術，亟需從外國進口新科技；如外貿不振，這方面自然受到不良影響。

為解決政經改革上的難題，蘇共不斷採取新措施，例如繼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改組蘇共各級領導結構，加強黨紀、提高黨員責任感；在今年內全部工業企業一律納入「經濟核算」的經濟機制之內，加緊推行農業改革，嚴格整頓經營不善的企業，改善對外經貿活動，籌畫物價改革等。此外，蘇共還進行下列幾項特別措施：

(1)準備召開一次特別中央全會以討論與解決民族問題。去年十一月蘇共中央已決定，今年年中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專門廣泛地與澈底地檢討民族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現在，籌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2)全力發展民生工業。這是蘇聯今年經濟發展的重點，亦就是加緊日用消費品工業部的發展，其產出將是生產資料生產的一點五倍。此外，蘇聯將增加消費品的進口，並從今年二月一日起至一九九〇年底，限制消費品的出口。這些被禁出口的物品包括兒童服裝及魚子醬。^③同時，若干兵工廠開始製造食品加工的機械設備，以期改善食品工業。

(3)在兩年內，裁軍五十萬。去年十二月初，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發表演說中說，在最近兩年內，蘇聯將裁減五十萬軍人與相當的傳統武器，並試圖把「軍備經濟」過渡為「裁軍經濟」。^④戈巴契夫這一聲明實在是一石二鳥的作法。一方面向世界表示其和平的誠意，一方面則可大量削減國防開支以紓解其財經上的困難。

註② 莫斯科華語廣播輯要，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五頁。

註③ 英文中國日報 (China News)，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第三頁。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八日，第二頁。

結 論

戈巴契夫所推行的改革雖然遇到不少難題與阻力，但可以斷言，蘇聯政經改革已經是一個難以逆轉的過程，因為對政經改革而言，也存在不少有利因素。第一，戈巴契夫的權力已經相當鞏固。去年九月蘇共最高領導階層的舊老已全部被排除，戈巴契夫的對手李加察夫被推到權力邊緣；十月初戈巴契夫獲兼國家元首之職，集大權於一身。第二，政經改革獲知識分子的支持。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支持蘇共當局的改革。昔日反蘇共政權的人權運動領袖沙哈洛夫居然在國外奔走，為戈巴契夫解決困難。在實際上，他呼籲西方政府支持戈巴契夫的改革；在國內為解決民族紛爭奔忙。第三，反對勢力薄弱，缺乏有力的中心領導人物，且一時提不出改善蘇聯現況的具體辦法。第四，戈巴契夫作風穩健，不急不徐，決策過程完整合理。

今年六月下旬，蘇聯將選出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第一屆人代會將選出蘇聯政權有史以來的第一位有實權的國家元首（最高蘇維埃主席），及首屆專職的最高蘇維埃（類似西方的國會）。可以預見，蘇聯將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上層權力結構。從某一層意義來看，這將有利於蘇共改革的推行。

今年內，蘇聯經濟雖然不會很壞，但不會有意外的成績，民生日用品可能有較高的成長，但總的國民生產收入不會超過去年。根據蓋洛普在莫斯科的一項意見調查（五五七人接受訪問），百分之十二的受訪者認為，一九八九年經濟會比一九八八年繁榮；百分之十八的受訪者認為與去年相同；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認為較去年困難；百分之十八的人無答案。^⑤

就蘇共改革的前景看，有冒險，也有希望。若無意外事件發生，政經改革將繼續推行，其結果也許不會合乎戈巴契夫的理想與人民的希望，至少可以使蘇聯平安地渡過另一個危機。

註⑤ 消息報，一九八九年元月一日，第一頁。

*

*

*